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山东重要历史人物

主编 王志民

第四卷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山东重要历史人物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卷主编 翁惠明

第四卷



目 录

成 瓘	/001
王照园	/003
马益著	/005
周天爵	/008
翟云升	/013
刘鸿翱	/015
王培荀	/017
王 筠	/020
陈官俊	/026
杨以增	/029
牟墨林	/037
刘韵珂	/039
刘喜海	/044
马国翰	/046
吴式芬	/051
许 瀚	/057
贾 祜	/062

王东槐 /063

黄恩彤 /065

傅汉章 /068

张士保 /069

杜 翰 /070

李佐贤 /072

毕道远 /077

丁守存 /078

毕承昭 /081

陈介祺 /083

傅振邦 /087

匡 源 /089

阎敬铭 /094

林凤官 /099

王之翰 /101

丁宝楨 /102

宋 庆 /107

马新貽 /115

张兆栋 /120

刘德培 /124

桂锡桢 /126

李宗岱 /129

冷鼎亨	/134
孙凤翔	/136
郭 磨	/139
吴浔源	/140
宋书升	/142
陈士杰	/145
戴恩溥	/148
丁艮善	/151
杨绍和	/152
李秉衡	/157
田在田	/163
蔡玉珂	/164
张 曜	/166
孙毓汶	/169
陈守和	/172
王石经	/175
丁汝昌	/178
狄考文	/183
左宝贵	/187
周 馥	/193
武 训	/196
何老凤	/204

- 孙葆田 /205
张汝梅 /210
张弼士 /216
吕海寰 /220
宋景诗 /224
毓 贤 /231
赵尔巽 /237
夏辛酉 /241
王懿荣 /246
徐建寅 /249
李提摩太 /255
曹鸿勋 /260
范春清 /264
杨玉福 /266
曲诗文 /267
柯劭忞 /273
朱红灯 /277
王锡蕃 /282
安治泰 /288
张莲芬 /295
高鸿裁 /300
孙中新 /301

高熙喆 /	305
刘 鸮 /	309
刘明杰 /	312
徐继孺 /	313
栾来宗 /	316
赫 士 /	319
陈 冕 /	321
阎书勤 /	322
詹姆士·马茂兰夫妇 /	328
于宗潼 /	330
孙宝琦 /	332
张鸣岐 /	338

成 瓘

成瓘（1763—1842），字肃中，号箎园，晚年号古稀迂叟。乾隆二十八年（1763）生于邹平县城西郭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祖父成兆丰，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高唐州学政，著有《竹斋集》诗文四卷。成瓘自幼酷爱读书，博学强记，富于卷轴。17岁补县学生，21岁结文会于富相山。常谓：人当究心古籍，别有以自立。乾隆三十八年（1773），出馆长山，遇沾化进士韩逢伯，被誉为“字作金石，文呈云霞”，在当地颇有声名。

嘉庆六年（1801），成瓘以优廪生得中举人，此后文名渐起。然九入礼部春闱，而终不第，自愧有负先人之望，因自号“箎园”，遂放弃科举，沉酣于古籍，专心于著述。自谓“检校经文，每多漏义，不胜掇拾；略其可细，第辩论其得失之大者。又妄抗衡先儒，专攻考据矣”。复以湖北叶云素、江西刘金门为师，不顾年老，游潜于经籍，直至晚年，手定《箎园日札》八卷。对《诗》、《书》、《礼》、《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经籍，对《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等史书，殚精研确，掇漏刊误，辨伪存真，颇多创见。对天文地理、地域沿革、周髀径隅，无不涉猎。成瓘与清末著名学者、《癸巳类稿》的作者俞正燮是至交。俞认为他在《尚书》方面的研究，可以补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缺失；他对古漯渠、洺水、枯渠及黄河古道的考证，可以补正胡渭《禹贡锥指》的遗漏。收录在《箎园日札》中的《石鼓辨证》，是其晚年的精心之作。

石鼓，是唐朝初年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发现的古代留存下来的

文物，共有 10 个，形状像鼓，上面刻有四言诗铭文。这些铭文叫石鼓文。自唐以后，人们对其多有考证研究，韩愈认为是周宣王时物，是没有被孔子辑录在《三百篇》中的“逸诗”。苏勖则认为是周宣王的诗，是太史籀书（又称篆书）。欧阳修虽没考确，但颇多怀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瓘则通过博考广证，以小学印证鼓文，以古文勘对史实，从而把石鼓文产生的年代推定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二月，由田歧山所刻《石鼓辨证》一书，一时名播遐迩。俞正燮致成瓘书云：“两手接书，深蒙教益。”“推《石鼓》为太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画合。阁下一言胜马生（定国）万余言矣。”各地学子也多有奔其门下者。成瓘则不自矜，不惮劳，每与人讨论学问，不论学业齿德，皆虚怀若谷。

成瓘一生涉猎极广，研究颇深。嘉庆八年（1803），曾受邹平知县李琼林之聘，续订《邹平县志》。道光四年（1824），又受江西府署李星白之请，课其二子，后又教其长孙。道光八年（1828）五月归里。道光十一年（1831），受聘济南府太守王霞九，重修《济南府志》。历经两年半时间告竣。事竣归里，仍以课徒为业，并以所得修志馆金、束脩之半扩修玉泉义学。其间几遭挫折而终不悔。“偶与友瑞斋谈往事，瑞斋谓‘世路悠悠，我辈只讨心与义两无愧耳’。成瓘慨然曰‘子亦迂乎，此言中吾志矣’。”从而有晚号“古稀迂叟”之名。

成瓘还精于算术，对《周髀算经》及汉代尺度权量都有精当的研究阐述。对医学也颇有研究，著有《萑园医说》。此外还有手辑《成氏丛书》、《续札》二册、《余札》二册。

成瓘卒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享年 79 岁。

（本文主要参考曲延庆之《邹平通史》，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孙福斌）

王照园

王照园（1763—1851），字瑞玉，号婉俭，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河北村人，清末女诗人和训诂学家。

王照园出身于书香门第。6岁丧父，在母亲教诲下，幼读《孝经》、《内则》、《毛诗》。15岁知励志，兼读经史，20岁即作《葩经小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与著名经学家郝懿行结婚，志同道合，感情融洽，常以诗词唱和，其唱和之作，编为《和鸣集》，收诗46首。她既是郝生活上的伴侣，又是其学问上的诤友。与郝评经论史，遇观点相抵牾时，每常争论竟日。因此，清代学术界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的说法。“高邮王父子”，是指江苏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精通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是有名的朴学大师，著述皆传世名作，人称“高邮王氏之学”；郝懿行精于名物训诂之学，对经学颇有研究，著述丰富，其夫人王照园亦颇涉经史，会诗能文，夫妇研经，一起著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王照园虚心好学，常以“平生要做校书女，不负乌衣巷里人”的诗句自勉。《列女传注》是东汉女史学家班昭注释《列女传》的著作，其书早已佚失。王照园为《列女传》作补注，完稿后，又经郝懿行订正，成书《列女传补注》8卷。

郝氏夫妇喜欢研究《诗经》。新婚燕尔，王氏就在《却扇》一诗中写道：“千里良缘彩线牵，三冬谷旦结团圆。挑灯最喜亲风雅，先说《周南》第一篇。”她自幼习《诗》，长而喜《诗》，对《诗经》有独到的见解。她对《诗经·小序》及毛传、郑笺不迷信，不盲从。她对朱熹的《诗经》注释犹不满意，认为有些注释晦涩

难懂，故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重注《诗经》，后因故停笔，其稿多已散失。嘉庆八年（1803）又重整旧稿，并同丈夫一起研究考订，以答问的形式，写出二人对《诗经》的新解，以《诗问》七卷行世。郝懿行之《尔雅义疏》亦“问采照说”即偶尔也采纳王氏的观点。

王照园为人贤达。嘉庆四年（1799）郝懿行中进士，授户部江南主事。王照园随夫进京，同当时的文人、学者广泛交往，并受到尊重。曾为尚书阮元题诗“齐名积古从公定，室有藏书是母留”。阮元依句改居室“续古斋”为“积古斋”。郝懿行曾一度因病中止《尔雅义疏》的著述，王照园一面护理丈夫，一面帮助缮清整理，积之成册。郝懿行常说在自己的著作中宗“照园说”甚多。道光五年（1825）郝懿行去世。郝懿行虽中过进士，但宦途不显，以户部主事这样一个小京官终其身。著述虽多，身后却很凄凉。牟庭为他写的《墓志铭》里说，郝懿行“死后无钱举葬，夫人欲归原籍不能，羁留京邸，不知所依”，境况凄苦如此。王照园回归故里后，深居简出，专门整理丈夫遗著。可以说，郝懿行的著作中处处都有她的心血。在郝懿行生前友好的帮助下，其孙顺天府同知郝联薇陆续刊行《郝氏遗书》，王照园曾参与校勘。《郝氏遗书》是山左名贤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王照园自著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正》、《梦书》、《晒书堂闺中文存》、《葩经小记》等。

当时著名学者臧庸和马元伯都曾为《列女传补注》作序。臧庸在序中写道：“时有父子著述，一家两先生者，王石渠观察暨令嗣曼卿学士也；有夫妇著述，一家两先生者，郝兰皋户部暨德配王婉铨安人也。”臧氏还曾称赞王照园的文章“性情真挚，文辞高妙，得六朝文法”。可见，郝氏夫妇著述，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清咸丰元年（1851），王照园病故，享年 89 岁。

（洛 川）

马益著

马益著（生卒年不详），字锡朋，又字梅溪，临朐县胡梅涧村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岁贡。志书载他“赋性聪颖，十岁能属文，长老异之”。他勤奋好学，才思敏捷，一生著述颇多。他敢于摒弃当时视为正统的八股文而从事白话文的写作，实为一大创举，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早了约160年。由于他生长在农村，故在写作上提出“文本庄农，言应俚俗”的主张，开辟了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新路。他的著作除《庄农日用杂字》外，比较流传的还有《水灾传》、《舌耕传》等。《水灾传》用文词两种形式，真实地描绘了清雍正八年（1730）临朐发生大水灾的情景；《舌耕传》则以其亲身体验，把封建社会在学塾教馆的穷教书先生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其诸多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受人们欢迎和传颂的当属《庄农日用杂字》。

《庄农日用杂字》是马益著最著名的创作。该著全文共474句，每句5字，共计2370字。篇幅不长，内容却十分丰富，是一部典型的农家百科全书。从时间上看，从“开冻先出粪”写到“辞皂在眼前”，全部写完整整一年的农事活动。从手法上看，它虽称杂字却组字成句，句句都有较完整的意思。通篇从春种夏锄，到秋收冬藏，按照季节的特点、时间的先后次序，写出全年农事活动，从“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写到“领墒黑罩角，先去耕河滩”，再写到“下手种蜀秫，早谷省的翻。”又写到“行说立了夏，家家把苗剌。带着打桑斧，梯杌抗在肩。捎桑把蚕喂，省把工夫耽。”最后又写到收获“割谷榜荏子，蜀秫又中

砍”，至于收麦、搬运、打场、扬场、晒麦、入囤，更是具体生动。

《庄农日用杂字》在写生产知识的同时，也写出了农家生活。如既写了“粘粥小豆腐，煎饼随时摊。蒸些养麦角，蘸着蒜糜餐。烧汤泡干饭，烋饼也休嫌。擀饼大犒劳，豆腐小解馋”的平民百姓，还写了“清晨用点心，晚上吃糖圆”、“对虾并蟹子，贵些不疼钱”，“驼蹄与熊掌，猴头燕窝全。哪怕天鹅肉，说要也不难”的富豪人家。在记述了平民百姓后用“说的咱家话”一句，纯朴可亲，说明作者是站在平民立场上而写书的，这当然也是被人们所广为传颂的一个重要因素。

《庄农日用杂字》明确写出了“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的写作目的，他避开了杂字的单调与古板，在写出全年农事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自然无痕地写出了各项活动及相关器具用字，总结了如“下手种蜀秫，早谷省的翻”、“棉花严耪耨，芝麻种须揅”等生产经验；“打张铁粪杈，买个荆条篮。早起拾大粪，春季种庄田”等勤劳本色，“买上群廓落，冬天好踹栏”、“谷穰和谷桡，喂牛不甚甜”等饲养知识；“擀饼大犒劳，豆腐小解馋”、“案板买一页，树根也休嫌”等持家之道；“刑刀铁匠打，泥板把儿弯。铤凿锯斧挫，木匠有往还”等工匠器具；“看马备鞍笼，盖路挟红毡。前拥后护的，像个八品官”等婚嫁场景；“瓜钱麦门冬，荔枝和福圆”、“弱人服参汤，肚壮吃黄连”等食疗验方；“烹茶须好叶，第一数六安”、“青海南葡萄，闽姜辣又甜”等生活知识；“生财由大道，勤人不肯闲”、“若不好生过，如何能这般”的人生哲理，等等。他还抓住了口头文学这个至关重要的流传要素，如：“行说寒风至，身上一挂单”，“煤砟炉虽好，生火大冒烟”，“首饰无多用，假的就省钱”，在描写一件农事或一个农家活动转写到另一件农事或另一个农家活动时还运用了“小妮在怀里，抱着还叫唤”、“贪讲人家话，大事上心间”等趣味横生的过渡语言，更显其民间口头文学之功底。

《庄农日用杂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通篇俗语俚句，一韵到底，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一气呵成。它既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口头文学读本，也是一部实用的农用“教科书”，更是一部民俗方言的“百科全书”。

(林正文)

周天爵

周天爵（1772—1853），字敬修，清代山东东阿县宴营村（今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人。他自少坚强自立，刻苦好学，深信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的学说深信不疑，并坚持实践。

嘉庆十六年（1811），周天爵进士及第。道光四年（1824），授安徽怀远知县。怀远一带经常遭受水灾，周天爵上任后，劝民捐设丰义仓，以备不虞。经两江总督陶澍奏请奖励，“下部优叙”。此后，周天爵又带头捐输，并劝富户捐款修筑郭陂塘、龙王坝等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既能防御洪水，又可灌溉农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地百姓对周天爵此举十分满意，“民至今赖焉”。皖北“盗贼”横恣，且与胥吏暗通，民众深受其害。周天爵赴任后，大刀阔斧，很快以极刑惩除。有人以其用刑残酷上疏弹劾，总督蒋攸钰奏言：“天爵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古良吏也。”道光皇帝深信其言，遂谕曰：“不避嫌怨之员，最为难得，小过可宥之。”连擢周天爵为宿州知州、庐州知府、庐凤颍泗道，“备兵凤阳，陈臬百皖”。道光十五年（1835），周天爵又先后升迁江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周天爵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时，周天爵“免冠摇首”，连说“不如不如”。他指出：“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

道光十七年（1837），周天爵任漕运总督。时漕务积弊甚深。周天爵严加整治，劾卫官12员儆众，漕务形势立变，“诏褒勉之”。道光十八年（1838），周天爵调署湖广总督，寻授河南巡抚，擢闽浙总督，均未到任，后调授湖广总督。当时，汉口镇经济繁荣，帆樯云集，货财萃积，但往来商贾往往苦于“盗贼”之患；陕、楚交界之处，亦常有“强盗”出没，民众深受其害。周天爵一面竭力捕治“盗贼”，同时“劾失察有司及承审纵延者，悉褫夺其职”，又“遴干吏暗侦，与地方官掩捕，以获盗多寡定功过。”这些措施均立见效果，因此，周天爵“每有疏陈，宣宗辄手诏褒嘉”。

道光十九年（1839）前后，湖北连年洪水泛滥，长江汉水各属大堤多次溃决，百姓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时任湖广总督的周天爵深感治水工作的重要，积极采取治理措施。奏请朝廷“依治黄河法，遇险立挑坝，并以草护堤”；“其张壁口一带情形，或就分泄之水，使之冲刷成河，或仍行堵塞，以归正流”；并请以工代赈。宣宗皇帝全部准奏。

道光二十年（1840），刚刚修复的江汉堤坝又复溃决，清廷命周天爵查明原因，追查责任，制定措施。周天爵经过深入考察调查后得知，水利工程质量之所以如此低劣，其主要原因是治河官吏偷工减料，蒙混欺骗，遂对直接责任者进行了处罚。为消除这一弊端，他拟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凡“有大工、解任专治，立限侏工，限内失事者罚。”为了彻底治理长江、汉水，他又制订了详细方案；为清除江中沙滩，疏通河道，他提出了“以水治水，逼溜克沙之法”。针对荆门直隶州、襄阳府、郢阳府一带多溪河湖泊，“汪洋四五百里，恃一堤以判隔江湖”的状况，他上疏建议“改闸门为滚坝，冬闭夏启以宣泄之”。汉水蜿蜒曲折，“多有闷溜搜刷堤根”，每逢汛期，其堤岸经常溃决。周天爵又疏请在冬季水小之际，设立挑坝，“以克沙洲”，并“于两岸堤畔，用砖石多砌斗门，一交夏令，水及斗门之半则启之，过大则闭之”，以便有

效地控制水势。他制定的一系列规章、方案，以及上疏所提出的大量建议，均得到皇帝的批准和支持，并付诸实施，收到较好的效果。由于治理水患特别认真，恪尽职守，他多次受到道光皇帝的褒嘉。周天爵在任漕运总督期间，曾对漕运官员的种种劣迹予以揭露，并将不称职官员及时革除。道光皇帝对他这种忠于事业、无私无畏的精神十分感动，曾感慨地对他说：“汝能如此认真办事，朕心喜悦之至！”

同年，因周天爵之子周光岳代人说情，周天爵未经查实而予允准；又因其驭吏严厉，多用酷刑“如吸洋烟者，剪唇。作讼师者，截指。行窃盗者，抉目”，以多用酷刑而被革职查办，戍新疆伊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周天爵奉命赴广东前线，交由靖逆将军奕山及钦差大臣耆英差遣。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奕山等以周天爵“任劳任怨”上奏，得旨免罪，参与抗英军务。赐周天爵四品顶戴，以知府候补，调江苏办理清江防务。海防事竣，随留治淮、扬善后事宜。不久，赐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兼署南河河道总督。第二年，周天爵因滥用刑罚及失察漕书私镌关防，连被吏议，于是“疏请去职，命以二品顶戴休致”。休致后，“卜宅于宿州之闵子集，乡居无事，日从事于农圃。课晴问雨，见者多不知为大僚”。

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道光帝去世，二十岁的咸丰继位，意气似乎更盛。英国并未放弃立场，谋避开广州，直接与北京交涉。“休致”中的前任湖广总督周天爵，上疏痛陈鸦片每年所费数倍正赋，莠民奸宄，均以口岸为渊藪，与夷人勾结，“失今不治，伊于胡底？”主张以贼攻贼，诱敌深入内地，合力歼之。

咸丰元年（1851）初，洪秀全领导的农民军宣布起义，反对清政府对外妥协和对人民加重压榨的政策，矛头直指清廷。清政府对太平军惊恐万状，在起义前夕，就急忙命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会同钦差大臣李星沅前往镇压。三月，周天爵抵达广西。当